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3月2日 第B4版)

三、去留

二：这些学者、教授、科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大多不属于政治性思维，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从政治上的“左”和“右”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一心牵挂和始终惦记的只是学术，学问，学科，专业和技术。在大陆几十年、或研究或执教，都累积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如，有较好的研究环境（大学或研究机构），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比较完善的实验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学生，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说不上呼风唤雨，也算得如鱼得水，而漂泊至孤岛，则一切从零开始。两厢对比，孰轻孰重？无须细算，任何一个以专业立足，以学问为本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记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员曾对我说，自己看过一些知名专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信札，当其得知先期抵达台北的同事几家人都挤住在大大的仓库，每家仅以铁丝布帘相隔的情况，顿时全身凉透。心想：到了那边，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样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则担心一次永不回头的远行，自己的身体恐怕就吃不消……诸如此类，切切实实的问题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而每一个问题的分量都关乎他们的毕生事业，每一个问题都超过了判断“左”与“右”。

三：这三嘛，就涉及到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时政、对中共的认识了。冯友兰、汤用彤等人讲过：他们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它走没有希望；对共产党则完全不了解。说句老实话，在韩战爆发以前，没有几个人认为蒋氏政权在台湾能长久维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点，毛泽东自会把它干掉，就连美国白宫亦有所估计和准备。抗战结束后，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看好蒋氏统治，已是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包括储安平在内，不认同共产党，但更不满于国民党，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指币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储安平以“拆烂污”心态对待国民党，这句名言也最终导致《观察》被查封。溃败的国民政府并非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么好。

至于对中共的认识，我想引用李宗恩写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里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不能忽视包括北平在内的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成为现实，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面会有不受政治影响的一定自由度，虽然其重点可能有所改变。这个重点可能会在牺牲教育的标准和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社会方面……”（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 it is still 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 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 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 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 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tandard.”）

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后，这些接受良好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所估计，估计会不同于国民党，但也仅仅是“有所改变”罢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想不到登台后的毛泽东会那样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父亲和罗隆基在家里说的一段话：“我曾经是共产党，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们的一套。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党是那样地差，人是那样地坏。”这话是说在土改、肃反、肃胡、反右、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即使砍了他们的头，也想不到还有一个“文革”。而在1949年前后，大家都在热烈期待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政权。所以，陈寅恪选择了广州，不奔赴台湾，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选择了协和，因为台湾没有协和，协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四、易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对李宗恩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热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心里明白：共产党需要好医院，好医生。

1949年7月13日，全国首次自然科学会议筹委会全体开会，邀请李宗恩出席

7月14日，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会议揭幕，李宗恩为主席团成员，成员共41



1950年，李宗恩与协和护校毕业生合影。

人。

7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为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上面有李宗恩的姓名。

9月29日，李宗恩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登上观礼台。

江山易手之初，协和没有被新政权接管，美国高级职员均回国述职。1951年1月20日，李宗恩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去电报，电文只有一句话：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协和向洛氏发出最后的声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的合作历经三十五年后，骤然而止。也就在这一天，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面接管。学校和医院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并宣布：院长李宗恩；学校和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变；经费由教育部拨款；教职员工原职原薪。

1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消息，全院师生员工欢欣庆祝。李宗恩表示坚决拥护，于26日发表谈话，对未来的协和抱有信心。他说：“我们希望今后在教育方针上应有明确专点，或着重教育，或着重业务，

或着重训练。我相信在政府领导下，协和一定可以办得更好。”意想不到的，大洋彼岸的小洛克菲勒的朋友也写下类似的话：“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结果呢？

结果是于1952年的元旦，中国协和医学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即移交军委。协和高级护校停止招生。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三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当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1月9日《人民日报》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专栏里，刊登了李宗恩文章《我和协和医学院》。这是一个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的响应号召，在政治运动中“自我反省”的开始。

1953年，协和医学院停止招生，改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部队医务干部水平，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对这样“完美的结果”，李宗恩无话可说。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